

赛珍珠研究资料

1999 年

宿州师专图书馆

目 录

- 1、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 赛珍珠及其故居 卢海鸣
- 2、试析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 徐 清
- 3、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赛珍珠研究 郭英剑
- 4、评 1931 年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大地》的两篇书评 郝素玲
- 5、1931 年东方人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大地》的三篇书评 郭英剑 译
- 6、从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谈“史诗”精神 朱希祥
- 7、赛珍珠研究断想 鲁跃峰
- 8、赛珍珠谈她的父母
—— 《异邦客》、《战斗的天使》合论 王守仁
- 9、新中国赛珍珠研究 50 年 郭英剑
- 10、传记要慎重对待名人之恋
—— 以“赛珍珠徐志摩之恋”为例 姚君伟
- 11、是我们欠了她的
—— 读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 邵 建
- 12、世纪之交说说赛珍珠 姚君伟
- 13、翻译勿忘考证
—— 评《我的中国世界》中译本 奚兆炎

●卢海鸣

走进名人圈

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赛珍珠及其故居

在南京鼓楼平仓巷(今南京大学北园西墙根下),有一幢典型西洋风格的小洋楼,这就是赛珍珠故居。现为南京大学科技实业集团公司与南京大学产业办公室的办公楼。

该楼坐西朝东,砖混结构,高2层,坡屋顶,屋顶建有老虎窗。另建有地下室。大门口有雨篷,以4根西方古典风格的圆形立柱支撑。

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 ~ 1973年),原名珀尔·西登斯特里克·布克,是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她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父亲为在华长老会传教士。她出生刚4个月便被父母带到中国清江浦(今江苏淮阴)。1894年,随父母移居镇江,先后在镇江市私立崇实女子中学(今镇江市第三中学)和上海读书。她在中国长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行清理、调整,对出现的问题有分别、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处理,使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当时我们穿的黄土布军装,除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外,左臂上又增加了一个椭圆形臂章,臂章上白底蓝字,上面一排弧形字是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间是通行证三个大字,下面是编号。参加接管工作的南京地下党同志也换上了军装,因军装是用细洋布赶制出来的,他们反倒羡慕二野同志穿的土布军装。我们曾经在原国民大会

堂听了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主任是刘伯承,并兼市长)做的关于新区政策的报告。报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城市接管工作要注意“四面八方”的指示。所谓四面八方就是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个关系及所涉及的八个方面。特别强调城市工作要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工商业系统要解决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问题。报告在谈到接与管的关系时,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句话:“接收,是阶段性的工作,是一月两月的事;而管也

就是管理和建设,却是千秋万代的不朽大业。”“一定要把南京这座消费城市,改变成生产城市”。

在南京地下党组织下,人民群众开展的护厂、护校斗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接管。全市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学校迅速复课,市场供应有了保障,社会治安得到加强,这样市民生活也就一天天安定起来。一时,“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遍工厂、学校、街头……。

(责任编辑 宁宁)

她因崇拜中国清末名妓赛金花而取名赛珍珠。17岁时,她回到美国,进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学习心理学,毕业后又返回中国。1917年春,她在镇江崇实女子中学教书时,与美国青年农艺师约翰·布克(John Buck)缔结良缘。之后,他们在安徽宿县工作了5年。1921年秋,他们迁居南京。在1921年至1931年间,她曾任金陵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外文系教授,布克任农学院教授,当时她和布克就住在这幢小洋楼里。她从1922年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她以撰写反映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长篇小说闻名于世。在这里,她撰写出了她的处女作《放逐》,并完成了她的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1931年),给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许多美国人说:“认识和了解中国,是从读《大地》开始的。”此后,她又创作出《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等多部重要作品;还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出版,取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933年)。1932年,她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38年,她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给予她作品的评语中写道:“由于她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的丰富多彩而真挚坦率的史诗般的描绘”,她的作品是“传记文学的杰作”。

赛珍珠于1934年与约翰·布克离婚,1935年回到美国定居后,与约翰·戴公司总经理、《亚细亚》杂志主编理查·沃尔什结婚,但她对南京仍充满了怀旧之情。她回忆在南京生活的片段时写到:“在这里,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我住在南京的一所旧砖瓦房里,房子四周是一座我喜欢的大花园。在那里,我种树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们在花园里,夏天在这里进餐,朋友们带着孩子同我们一起在这里游憩。”

据传,赛珍珠寓居南京期间,曾与中国著

名诗人徐志摩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那是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为他担任翻译的是徐志摩。在一次宴会上,徐志摩与赛珍珠相识,开始他们之间的交往。关于这段不寻常交往,赛珍珠生前曾透露给她的两位密友:一位是莎拉·布顿,另一位是诺拉·史迪琳。赛珍珠去世后,她们公开了赛、徐之间的这段风流韵事。莎拉说:“赛珍珠有个中国情人,这就是有中国拜伦之称的徐志摩。”诺拉写了一本《赛珍珠传》,更是把这段“艳史”毫不隐讳地公布于世。不过,对于这段“艳史”,徐志摩生前从未提及,因此,是真是假,也就只好任凭世人去说了。

1937年,南京沦陷后,贝茨(Bates)、麦卡伦(MaCallam)、费奇(Fitch)、密尔士(Mills)、史密斯(Symthe)、里格斯(Riggs)等一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国际友人曾经居住在赛珍珠故居中。

赛珍珠于1973年去世。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她的葬礼悼词中,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

1998年10月17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南京大学并接受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次日上午,他专门参观了赛珍珠故居,以表达对这位已故伟大作家的怀念。布什和千千万万美国人一样,正是从赛珍珠的作品中,获得了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并萌生了对中国的好感和向往。他在就任美国总统期间,为促进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

·赛珍珠专题研究·

试析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

徐 清

摘 要 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曾对赛珍珠作过评价。今天看来,鲁迅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说这些话的,而且不是对赛的全面评价。赛珍珠成就卓著,但她始终不能跳出自身经历的局限而将问题放到广阔的历史、现实背景中去探究,因而鲁迅说她反映的是中国“浮面的情形”是比较中肯的。但由于鲁迅对赛与基督教的关系了解不深,因而鲁迅以“女教士的立场”评价赛珍珠是有些偏颇的。

关键词 鲁迅 赛珍珠 评价

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这样写道:“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即赛珍珠——笔者按),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系美国女作家诺拉·沃恩所作——笔者按),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赛珍珠的评价起起落落,然而,鲁迅的这段话却已是定论,许多人以此作为得力工具,或对赛珍珠其人诛笔伐,或对其作品不屑一顾,只作浮面的了解便妄下结论。虽然也有学者秉持公心,呼吁慎重理解鲁迅的这段话,但终因未做过详尽的分析与探源而导致说服的力度不够。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时代,赛珍珠研究方兴未艾。鲁迅在65年前所做出的评价自当不能回避。

学界误读鲁迅的这段话不外乎几种情况:一是将鲁迅的话奉为权威,想当然地拿来评论赛珍珠在1933年以后乃至一生的作品,导致明显的简单化倾向;二是紧抓住赛珍珠是美国人这一点,先入为主地认定外国人写不出中国的真相;三是抱住鲁迅说过的赛珍珠从传教士立场看问题不放,认为传教士

是搞文化侵略的,必诬蔑、丑化中国。这些情形都是将鲁迅的话断章取义,遮蔽了视线,妨碍了我们对赛珍珠这位世界知名作家的正确认识与客观评判。

首先应该搞清鲁迅是在什么具体情形下说这番话的。在这封信的起首,鲁迅说道:“《申报》上文章已见过……”这篇文章指的是姚克发表在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的《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该文评价了两部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即出版于1933年9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远东的前线》(*Far Eastern Front*)和诺拉·沃恩(Nora Waln)的《寄庐》(*The House of Exile*)。姚克称赞《远东的前线》对中国问题作了剀切痛快的评论,“其观察之精微和周密,描写手腕之生动和正确,立论态度之公正和透辟,实在可以使我们惊异。”他极推崇其中“关于中国民众和政治现状的几章和将来远东形势的推论。”特别引用了斯诺在“二三六页上”的话:“在多年的时期中,名义、政府、计划,都有变更,但台上演的仍是那么一出戏。种种不良的成分和性质似乎永无尽期的继续存在——缺乏意义、团结和科学的作用。”姚克批评了《寄庐》对中国不真实、极荒谬的描写,他举例说书中写了“十一月出嫁的女子明年二月已生了儿

子”、“十九路军的蔡廷楷变成了名闻全国的‘富于幻想的青年诗人’”、“一个六代同堂的中国家庭，其家谱竟能追溯到一百三十九代以上”。他尤其指出“其中有许多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谬论，却是情不容恕的。”比如：“她说中国在一九三一年春已经开始抵制日货，实际上直到七月二日万宝山事件之后。”姚克说这两本书给了他两种不同的不快意，前者是“客立本（Caliban）在镜中看见自己真面目”（引王尔德语——笔者按）的不快意，后者是“客立本在镜中看不见自己真面目”的不快意，他肯定了第一种不快意“教我们照见了自己的丑态”。同时十分反对诺拉·沃恩用“目睹者”自传口吻写《寄庐》，甚至建议“中国笔会不妨寄些言论到美国去，纠正这种谬误的印象。”文章指出，就是这样一本书，赛珍珠却赞道，“这本书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这更引起了姚克的大不快。鲁迅便是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复信给姚克的。

鲁迅到底读没读过赛珍珠的作品？这个问题的提出绝非荒谬。1933年12月以前，赛珍珠共出版了四部中国题材的小说，即《东风·西风》（1930）、《大地》（1931）、《儿子们》（1932）、《元配夫人及其他故事》（1933）。中译本的情况是《东风·西风》一个，即郭冰岩本，南京线路社，1933年3月出版；《大地》三个：伍蠡甫节译本（名为《福地译述》），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7月出版；张万里、张铁笙本，北平志远书店1933年6月出版；胡仲持本，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8月出版；《儿子们》一个，即伍蠡甫本，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12月出版；《元配夫人及其他故事》尚无译本。必须说明的是，赛珍珠作品的中译文多在当时的杂志上先行发表，尤其是《大地》，就在1933年全年的《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至第8号上连载，译者为宜闲（即胡仲持）。在鲁迅的藏书里，未有赛珍珠的作品。他的书信中也只有三次提到赛珍珠。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说：“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这封信并未提及赛珍珠创作的作品。1936年9月15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如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这封信似乎表示鲁迅已读过赛珍珠的《大地》，且有可能就是胡仲持译本，但1936年距离鲁迅评价

赛珍珠已过去三个春秋，大概鲁迅是1933年之后读到的也未可知。很可能，当时鲁迅只是通过朋友姚克的介绍了解了赛珍珠的作品。当然，我们并不排除鲁迅在1933年复姚克信前读过赛著，尤其是《大地》。毕竟，赛珍珠当时在上海大受欢迎，又靠写中国题材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轰动了美国。以鲁迅凡事求实的一贯精神和三十年代对美国文化以及美国人撰写的介绍、评论、描写中国的文字的注意，他这番话理应是在翻阅过赛珍珠作品的情形下讲的。从以上分析可见，第一，鲁迅并不象许多学人想象的那样对赛珍珠有多么重视，没必要把他的这段话奉为圭臬。第二，引用1933年的这段话评价赛珍珠的全部作品和她本人是十分荒唐的，根本无法涵盖她复杂变化的思想矛盾冲突及创作上的得失成败，更无从认清其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领域中的存在价值。

从复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只字未提姚克文章中谈及的斯诺及其《远东的前线》，而提出赛珍珠和《寄庐》来，作为“中国的事情……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的依据。同是对美国人，这的确昭示出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是低调的。

斯诺于1928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以局外人的清醒来看待中国。他深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各国进行艰苦的考察和冷静的对比，得出当时中国人祸胜于天灾的结论，十分理解并支持中国革命。鲁迅赞赏他的精神和眼力，在1933年10月21日致姚克的信中便说：“S君所见的情形，我想来也是一定如此的，不数年，倘无战争，彼土之人，恐当凌驾我们之上。我们这里也腐烂得真可以，依然是血的买卖，现在是常常有人不见了。”另外，当时的斯诺极欲了解中国创作界的活动，欲向西方介绍现代作家，鲁迅很赞许这一行动。斯诺与姚克合作，决定先搞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选集。1932年5月22日，鲁迅还应约写了《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后来由于出版上的困难，选集未能单独出版）。鲁迅对斯诺和姚克的信赖由此可见。所以，鲁迅读了姚克的文章之后，对姚克评价斯诺的话是持首肯态度的，复信中便不提。他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一方面，是以此语鼓励姚克用英文创作（以母亲的一生为题材）写出中国的真相；另一方面是针对《寄庐》和赛珍珠对中国的“浮面”的了解而言。鲁迅从不认为外国人一定写不出中国的真相，那么，他何以说

赛珍珠“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

客观地讲，赛珍珠与斯诺的确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取向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他们同以一双外国友人的眼看中国，但眸子里映出的中国形象却迥然有别。从襁褓中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三十几年的赛珍珠视中国为祖国（这一点鲁迅也承认），就情感的深挚程度而言，远甚于斯诺。但是，就对中国政治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的理解程度而言，她远不如斯诺。赛珍珠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道又一道屏障。

在中国，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潮更加激荡，同时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社会一片黑暗，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许多文坛巨匠积极投身到这一伟大的时代洪流中，努力挽救国家和民族，鲁迅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将和旗手。赛珍珠虽然置身于中国时代的大格局之下，但她独特的个人身世限制了她的视野，使之走上了一条独有的心路历程。首先，中国“反帝”斗争的锋芒曾经深深刺伤了她，义和团的排外运动给她留下了永远惊惧的童年记忆，北伐军不肖士兵对外国侨民的骚扰又给她的青年之心烙下了一道伤疤。尽管她对中国人民反对白人殖民主义的斗争抱有强烈的同情心，但在这个问题上，她与鲁迅等人有较大分歧。她认为美国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她认为中国的问题症结主要在于自身腐败而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她始终不能跳出自身经历的局限而将问题放到广阔的历史、现实背景中去加以探究，这使她无法达到鲁迅的高度。其次，在反封建问题上，赛珍珠作为有美国民主政治文化背景的人，当然不赞同中国的封建专制，但是，她并不知道中国的问题除了官场的腐败、人民的不觉悟外，根源却在于封建专制的制度体系。毕竟，她虽生长在中国，并没有在中国大家族制度下生活的体验，没有受过剥削和压迫的感受。再次，赛珍珠从小就浸染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中，虽不是狂热的信徒，却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其宗教观的核心是基督的人道主义、人类爱、人类大同思想。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进步作家，绝大多数都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化，他们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这显然与赛珍珠的宗教旨归相对立。由于赛珍珠的美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背景，她给中国指出的道路是改

良农业、发展医学和教育事业，她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以宋美龄为首的亲西方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一切决定了赛珍珠只能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看客，既不可能经历鲁迅那种心灵的焦灼、痛苦，也不可能象鲁迅那样站在时代的前沿探讨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赛珍珠置身于时代要求之外，从独特的文化背景出发，把向西方介绍中国当作自己的使命。所以，她并不是从思想启蒙或民族救亡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农民和农村生活的。

就《大地》而言，它以严峻写实的手法，勾勒出一幅旧中国农民的生活画卷。它既流露出对中国农民勤劳善良、热恋土地的品德的赞美，又写出了他们长期遭受水、旱、蝗、地主、土匪、军阀等天灾人祸的不幸。即如鲁迅和二十年代后半期“乡土文学”作家们对农民命运的关心，往往以农民的苦难和不幸为切入点，折射出时代的黑暗。鲁迅的《故乡》就指出闰土“辛苦麻木”的现实原因便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同时，《大地》又称得上是一幅壮阔的中国社会民风民俗长卷，举凡婚嫁、食俗、住宅、服饰、祭神等等均有描摹，与中国的乡土文学作家相比并不逊色。对于小脚、辫子、娶妾、祭神等客观存在的事物，鲁迅作品中也多有反映，赛珍珠文笔洁净，谈不上丑化歪曲。但是，如前所述，赛珍珠不会象鲁迅那样将疗救人的病态灵魂作为首要目标，没有鲁迅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强烈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便如斯诺面对中国人民的不幸而愤怒地发出“为什么不造反”的置问，当时的赛珍珠也是根本喊不出来的。若基于以上这些方面，鲁迅讲赛珍珠所反映的不过是“浮面的情形”还是比较中肯的。

最后再剖析一下关于“传教士”的立场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人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总是习惯于将“女教士”与“反动立场”联系起来，用抽象的观念去解释鲁迅的意思，造成了曲解。其实，鲁迅批评的重点是赛珍珠作品缺乏深刻性，未必对“女教士的立场”包含着多么大的贬意和敌意。

第一，先看鲁迅对基督教的态度。鲁迅少年时代，他的家乡绍兴已有基督教堂，并有女教士到他家传过道；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侵略中国，教案时有发生；鲁迅在南京读书时，也稍知义和团反洋和反教之事。鲁迅对基督教的最初了解，

确是建立在激烈反对列强侵略的基础之上的，但从他写给家人的信中看出他对当时反教会事件的叙述比较客观。直至留学日本时，尤其在决定从事文学活动之后，鲁迅才真正地开始全面了解基督教。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建立在对欧洲文明发展史的辩证考察中，这使他早年对基督教有极大偏爱，直到晚年，他对与之相关的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基督精神”一直持有审慎的肯定态度。

第二，如果说基督教本身与传教士并不能混为一谈的话，那么，鲁迅与传教士也并非势不两立的，他从不认为所有的传教士都搞文化侵略。例如，他对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多有肯定，认为这本书切中中国人要害，希望国人以此博观和内省，并希望有人将它译成中文。^①鲁迅曾驳斥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威廉士的《中国》一书，但并非因为作者的传教士身份，而是不满他关于中国人“好色”的无中生有的描述。^②由此可见，鲁迅不会因传教士的身份而对他们写中国的书不屑一顾或全盘否定。

第三，鲁迅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达到了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近或相似的认识，评人论事，都坚持从实际出发，一贯反对求全责备的思维方法，既善于短中见长，又善于长中见短。他对赛珍珠的评价是谨慎的、冷静的，“女教士的立场”一说并不意味着鲁迅对赛珍珠过分苛求。何况1936年9月15日那封致增田涉的信更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鲁迅的作风与姿态。

第四，鲁迅之所以提出“女教士的立场”，是有时代背景的，从1927年起，基督教会对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基本态度是“反共扶蒋”，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提倡读经尊孔和一切反共事业。它把重点放在农村，对共产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进行攻击和造谣诬蔑，企图同共产党争夺农民。1933年夏天，大批基督教上层传教士到庐山避暑开会，议题就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筹划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传教士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只有基督教才能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为配合反共活动，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从1927年起大量出

版《公民常识小简》10种，进行反共和宗教宣传；从1933年起，又出版了大量《农民宗教课本》，对农民进行毒化。甚至还出版了日本人贺川丰彦的《爱的科学》，鼓吹“中日提携”，要求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象对待“主内兄弟”那样去“爱”，为“中日和平”合作。这些赤裸裸的反共言行在当时的基督教各教堂、各类学校和出版物中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传教士寄希望于中国的反动派，企图取消中国革命。在这样的形势下，鲁迅用“女教士的立场”评价传教士赛珍珠也就顺理成章了，只是他显然没有将赛珍珠与作为侵略者的传教士类混为一谈。遗憾的是，鲁迅没有深入地了解过赛珍珠的思想境界，不知赛珍珠对“传教士”的情感态度。自小生活在传教士中间的赛珍珠，对他们的心胸狭隘，傲慢无礼，愚昧自私等品性了解得十分真切，从一开始就缺乏认同感，并把“传教士”当作一个令人作呕的名称。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她不得不保留着传教士身份，但她从未成为真正的女教士。1933年1月，为支持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欧内斯特·古金发表的《莱曼国外传教调查报告》，她发表了《国外传教团是否有理可辩？》，直言不讳地批评在华传教士的种种卑劣行径，由此被当作异端受到指控。赛珍珠也趁机愤而辞去教职。凭心而论，鲁迅以“女教士的立场”评价赛珍珠是有些偏颇的。

注释：

①参见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1933年10月27日致陶亢德信。

②参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参考文献：

①《鲁迅全集》第十二、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鲁迅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空前的民族英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傅长禄著《中国现代文化史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申报·自由谈》1933年11月11日。

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赛珍珠研究

郭英剑

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的创作始于本世纪的20年代末,然而,在10年时间内,她成为了美国乃至全世界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一问世即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并在1938年一举摘取了为世人所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赛珍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为题材的,所以,在3、40年代,她是我国文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她的小说一面世即被译成中文。

那时,国内众多的文艺刊物都介绍了赛珍珠及其作品。由上海文学社编辑、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杂志(创刊于1933年7月1日),在第1卷第5号上的“文学栏目”上,刊登有4幅“赛珍珠重来中国”的照片。同期还刊有胡仲持写的《〈大地〉作者赛珍珠重来中国》的文章,^①并有赛珍珠的小说《新路》(何达翻译)。上海的《矛盾月刊》在1933年2卷1期“革新号”上,刊有“勃克夫人肖像”一幅,并有庄心在的文章《布克夫人及其作品》。上海《女青年月刊》1934年13卷3期为“妇女与文学专号(特大号)”(编辑顾问为谢冰心),在“介绍”栏目里,有雨初的文章《〈大地〉作者勃克夫人》;同期有厚生的文章《现代世界女作家》,其中谈到“美国”的女作家只有两位:史沫特莱与赛珍珠。在“研究”栏目里,有“我的创作经验谈”一文,收入7位女作家的笔谈,其中有赛珍珠的一篇(由南枝译为中文),其他六位为:庐隐、凌叔华、王莹、白鸥、欧查与冰心。上海《文艺月刊》1933年第4卷第3期与第4期的“文艺情报”栏目中,均有“布克夫人来华”的报道。

上述这些关于赛珍珠的新闻报道反映了赛珍珠在当时的知名度,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我国学术界,同样对赛珍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值得我们今天研究赛珍珠时予以关注和重视。

纵观3、40年代的文章,我们以为这一时期的评论具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1) 对赛珍珠的评论非常注重文本分析。无论是褒扬赛珍珠的,还是贬抑她的,都是从文本入手,进而说明自己的观点。

叶公超的文章起首就说,“当听说一部描写中国的小说出自一位西方人之手的时候,能够阅读英文的中国人心明白,假如他不得不信的话,那他也只是将信将疑。”^②然而,在阅读过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之后,作者的印象是,“赛珍珠在《大地》中所写的某些东西却与众不同。”^③叶公超从王龙对土地的挚爱说到对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分析了赛珍珠在人物刻画、反映中国实情方面的成就。叶文认为,“赛珍珠忠实地刻画了中国人在中国背景下的生活,她完全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感情。”^④叶文指出,“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这是唯一的一次。”鉴于此,叶文给予了《大地》很高的评价,说,“《大地》是这块国土的史诗,并且将作为史诗铭记在许许多多阅读过它的人们的心中。”^⑤江亢虎从文本入手对赛珍珠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批评赛珍珠的《大地》过多地执着于“下流社会”中国人的特性与缺点”^⑥,并且,他认为赛珍珠的细节描写是不真实的,主要列举了“招魂”、“泡茶”、“送葬”等例证予以说明。伍蠡甫独辟蹊径从“管制”入手,分析了威权意识、孝以及爱,进而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庭以及社会的统治秩序。^⑦正由于注重文本分析,使得许多作者对赛珍珠作品中的优劣,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胡

风指出赛珍珠“对于农村底经济构成是非常模糊的”，^⑧便令人耳目一新。之所以当时众多的评论者注重文本分析，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以为，在于多数评论者大都留学英美，其中一些人就是赛珍珠作品的翻译者。而这是后来的多数赛珍珠研究者所无法具有的长处。

2) 由于注重文本研究，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章开掘深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伍蠡甫的文章，在分析威权意识时，还探讨了威权意识在男女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女子的美德，以受制于男子威权为主相，可是这美德的代价也不轻，得抹杀了一切自我，才能实现。”^⑨这种对赛珍珠作品中的男女平权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雨初的文章^⑩从风格、题材、结构、人物描写与写作态度几个方面，探讨了赛珍珠的创作，并通过比较《大地》与《圣经》在字句、文法构造上的相似之处见出赛珍珠所受《圣经》之影响。叶公超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他说，“在中国的小说中，农民心理研究至今还是个鲜为人知的主题。中国农民生活在自己独自的环境中，对此，有关他们的文学作品至今还没有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发人深省的。这既是对中国作家的提醒与鞭策，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赛珍珠作品的重大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叶公超称《大地》为“照亮了农民昏暗生活的一个侧面”^⑪，其评价恰如其分、令人信服。

3) 纵观这一时期的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赛珍珠的评论分歧是相当明显的。

胡风的文章《〈大地〉里的中国》起首便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在中国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女性作家，对于这个农村是怎样观察的？农民底命运和造成这样底命运的条件，在她的笔下得到了怎样程度的真实的反映？第二，这本书在欧美读者里面的惊人的成功，是由于她的艺术创造底成功，还是另有原因？”^⑫这样敏锐的问题，实质上触及到了对赛珍珠及其作品如何评价的命脉。将这两个问题普遍化，我们就能看到当时对于赛珍珠的认识与评论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赛珍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描述是否真实？反映的真实程度又有多少？赛珍珠在世界文坛一举成名，原因究竟何在？而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赛珍珠研究中是依然无法回避、也是依旧要加以深入探究的。

对于赛珍珠是否真实的反映了中国以及中国农民的命运问题，在当时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持否定态度的一方以江亢虎为代表，他认为赛珍珠描写失实和过于夸张。^⑬茅盾曾写有《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一文，文章分4节，他说：“第1节我告诉美国的读者，他们从赛珍珠的《大地》等小说中看到的中国农民和农村，是被很大地歪曲了的。”他还说：“正在英勇地担负起历史任务的现代中国农民，和《大地》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丝一毫相象的！”^⑭茅盾的这篇文章是为当时史沫特莱所编《中国革命作家小说集》所写的序，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出版，使得我们今天无法见到序的全文。而有些学者们则基本上肯定并承认赛珍珠的描写是反映了中国（至少是部分）的实际状况的。伍蠡甫说：“《儿子们》自然不比《水浒》、《红楼梦》的伟大，它确把握了现代中国的几个剖面，描写之又渲染之。”^⑮庄心在认为：“布克夫人的作品大都以中国农村社会为背景，善于剪裁，妙于运用，结构文笔，两臻俱佳。”^⑯胡风的观点是有趣的，更引人思索：“即使从现象上看到了‘穷苦愚昧’，但如果找不出它的来根去路，在理解上就免不了错误或歪曲，在艺术底创造上也就不能够达到真实了。”^⑰相对来说，陈衡哲的文章更加客观、理性。她一方面肯定了赛珍珠在《大地》中所反映的“实质性的内容”，称赞作者“熟知中国下层百姓的生活，而这源于她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地体察。其中的一些观察惊人的准确，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她又指出了赛珍珠的不足之处，认为小说“对人物缺乏个性的描绘、过于专注情节的发展以期符合预期的格调”，并且说，这将“无疑阻碍《大地》成为一部伟大小说的两大因素”。^⑱陈衡哲尽管评说了《大地》的缺点，但她说，还是“要向《大地》的作者表示祝贺：一来因为她深怀同情之心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的家庭；二来因为她创作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读者会发现你很难不把它一气读完。”陈文最后特别对赛珍珠的“忠实的创作意图、对人物持有真正的同情之心、脱离了做作的文风与腔调的束缚”，表示了极大的赞赏。^⑲

当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似乎更多的集中在：赛珍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而这种反映带给西方人的印象是怎样的？庄心在认为，“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以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民，是应当感谢的。”^⑳赵家璧对赛珍珠的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她的小说是自马可·波罗以来真正改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文学作品。他说：“许多写中国小说的人所以失败而勃克夫人的《大地》所以获得世界的——连中国的在内——赞美，

就因为前者单描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勃克夫人已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⑩茅盾则认为,“《大地》的作者虽然自以为是站在没有偏见的纯客观的立场,然而她对于许多中国农民的真正痛苦和要求是不了解的;因而她这部书并不能提高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⑪胡风在承认“赛珍珠女士对于中国农村人情风俗是相当熟悉的”的基础上,也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这个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⑫有趣的是,陈衡哲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赛珍珠对中国与中国人民,“尽管她深怀同情之心,但在一位中国人看来却只会感到:《大地》的作者终究是个外国人,毕竟没有融入中国人之中,她同中国人的关系也仅限于小姐与阿妈、学生与家庭教师而已,不可能有心智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中国人自由自在和坦诚相见的交往才能达到的境界。”^⑬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有一封专门点评赛珍珠的信,很著名,经常被人引用。鲁迅先生在1933年11月15日的《与姚克书》这样写到:“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指:赛珍珠——笔者),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为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⑭

对比一下,我们可以见出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鲁迅先生更加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为中国作家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就是把中国的真实情形反映出来,给世人、给后代“留下一个真相”。

然而,对于是否反映了中国实情的问题,赛珍珠自己有个辩解,她说:“我希望外界能了解我的,就是我所写的书,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我在我的书里,并不希望能表示出整个的中国民族来。我不过是就我所经验的,所知道的写出来,这一点,不过是只能代表中国的一小小部分——我个人所能领略到的一部分而已。根本,假若说有个个人能了解整个的国家,原是不可能的事,原是可笑的事,何况我就没有这样的本意。”^⑮我们以为,从这一番自我表白,可以看出赛珍珠的苦衷。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也可以感到当时中国学者对于她的希冀有多么大,而这种希冀在赛珍珠看来则是她所承担不起的。

这个时期的评论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对赛珍珠的态度是友好的,对她的介绍与评析是客观的。这一时期的介绍文章,大都对赛珍珠表示出了友好的态度。评论文章大都是有好说好,有不同意见往往是直言不讳。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评论:有理、有据、有节。然而,或许是由于年代久远、材料难觅的缘故,在以后,尤其是80年代至今的赛珍珠研究中,这一段历史似乎被人淡忘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高度,甚至有一些是我们至今想做而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的。

① 见上海《文学》杂志,第1卷第5号。

②③④⑤⑪ Ye Gongchao (Ye Chongzhi), “The Good Earth (book review)”,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 10(1931).

⑥⑬ 江亢虎:《一位中国学者对布克夫人小说的观察》,见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第4部分,载上海《矛盾月刊》,1933年2卷1期,第90页。

⑦⑨⑮ 伍鑫甫:《论赛珍珠的〈儿子们〉》,见伍鑫甫译《儿子们》,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版。

⑧⑫⑰⑲ 胡风:《〈大地〉里的中国》,《文艺笔谈》,上海书店,1936年版。

⑩ 雨初:《〈大地〉作者勃克夫人》,见《女青年月刊》,1934年13卷3期。

⑭⑲ 茅盾:《1935年纪事》,《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304页。

⑮⑲ 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上海《矛盾月刊》,1933年2卷1期“革新号”。

⑯⑰⑲ Sophia Chen Zen (Chen Hengzhe), “The Good Earth (book review)”, *Pacific Affairs* 4. 10 (1931)

⑳ 赵家璧:《勃克夫人与黄龙》,见上海《现代》,1933年3卷5期,第641页。

㉑ 《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㉒ 赛珍珠:《我的创作经验谈》,(上海)《女青年月刊》,1934年13卷3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生 邮编:210093)

评1931年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 关于赛珍珠《大地》的两篇书评^①

郝素玲

(河南师范大学 外语系,河南 新乡 453002)

摘 要:赛珍珠是美国著名的作家,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为《大地》(*The Good Earth*)。本文评介了于1931年发表的、不为人所知的、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大地》的两篇书评。

关键词:赛珍珠;《大地》;叶公超;陈衡哲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1999)05-0075-02

在赛珍珠的小说《大地》(1931)发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外国文学界对它的评论是众说纷纭。由于年代久远,我国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赛珍珠作品的评论现在已难被人们所看到。实际上,在1931年,有两位中国知名的学者曾用英文撰写了评介赛珍珠《大地》的两篇书评,这两位学者是叶公超与陈衡哲。本文拟对这两位作者所写的书评作一评介,以期引起赛珍珠研究专家、学者的注意。

这里评介的第一篇文章,原载北京英文杂志《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杂志1931年(10月)第3期。作者是叶公超。在文章末尾的作者姓名后署有:国立清华大学。

叶公超(1904—1981),原名崇智。1914年赴美读书,192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又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科主任,清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和图书馆长,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及主任。后曾任国民党的“外交部部长”等。1981年11月病故于台北。著有《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等。^②

外国人所写的、传统的有关中国内容的小说,无疑给中国人,尤其是能够阅读英文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往往是负面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所以,叶公超的文章起首就说,“当听说一部描写中国的小说出自一位西方人之手的时候,能够阅读英文的中国人心里明白,假如他不得不信的话,那他也只是将信将疑。”然而,在阅读过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之后,作者印象是“赛珍珠在《大地》中所写的某些东西却与众不同。”

叶公超从王龙对土地的挚爱说到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分析了赛珍珠在人物刻画、反映中国实情方面的成就。叶文认为,“赛珍珠忠实地刻画了中国人在中国背景下的生活,她完全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叶文指出,“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这是唯一的一次。”鉴于此,叶文给予了《大地》很高的评价,说,“《大地》是这块国土的史诗,并且将作为史诗铭记在许许多多阅读过它的人们的心中。”

1991年1月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了“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与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对赛珍珠的《大地》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称之为“史诗”,会后,这一结论曾引得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是把赛珍珠捧得太高了。《大地》能不能称为史诗,可以见仁见智。现在,撇开是非不论,至少可以说,将《大地》喻为“史诗”,不是始于镇江的讨论会。也就是说,在《大地》出版的同一年,就有国人认为它是史诗般的作品了。

收稿日期:1999-05-15

但是,我认为,叶公超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他说,“在中国的小说中,农民心理研究至今还是个鲜为人知的主题。中国农民生活在自己独自的环境中,对此,有关他们的文学作品至今还没有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发人深省的。这既是对中国作家的提醒与鞭策,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赛珍珠作品的重大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叶公超称《大地》为“照亮了农民昏暗生活的一个侧面”,其评价恰如其分、令人信服。

二

如果说,叶公超的文章代表了对《大地》持高度评价的一方,那么,这里要介绍的第二篇文章则代表了一种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态度。该文原载《太平洋时事》(Pacific Affairs)杂志1931年第4卷第10期,作者为陈衡哲,文章发表时作者署名为Sophia Chen Zen。

陈衡哲(1890—1976),女。1914年考入清华学校第一届留学美国,1920年夏,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北京大学西洋史兼英语系教授,为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后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③

与叶公超的文章相似,陈文也是从对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形象的观感入手的。文章说,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反映出外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待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的看法。“第一种态度是误解与蔑视。……第二种态度是对第一种态度的反驳。”陈文的观点是,“中国既非恶魔之地,也不是天使之国。她有着普普通通的民众,有欢笑,也有眼泪;有爱,也有恨,同地球上的人类别无二致。”并且认为,“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科学态度,它有助于国与国之间的理解和沟通。”然后,作者表明了自己对《大地》的态度:“最能展现、同时也最忠实地反映了这种态度的作品,无疑当属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了。”陈文接着对《大地》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她肯定了赛珍珠在《大地》中所反映的“实质性的内容”,称赞作者“熟知中国下层百姓的生活,而这源于她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地体察。其中的一些观察惊人的准确,令人信服,”另一方面,陈文指出了赛珍珠的不足之处,认为小说“对人物缺乏个性的描绘、过于专注情节的发展以期符合预期的格调”,并且说,这将“无疑是阻碍《大地》成为一部伟大小说的两大因素。”

有趣的是,陈文有这样一段话,赛珍珠对中国与中国人民,“尽管她深怀同情之心,但在位一位中国人看来却只会感到:《大地》的作者终究是个外国人,毕竟没有融入中国人之中,她同中国人的关系也仅限于小姐与阿妈、学生与家庭教师而已,不可能有心智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中国人自由自在和坦诚相见的交往才能达到的境界。”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有一封专门点评赛珍珠的信,很著名,经常被引用。鲁迅先生在1933年11月15日的《与姚克书》这样写到:“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指:赛珍珠——笔者),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为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④对比一下,我们可以见出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鲁迅先生更加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为中国作家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就是把中国的真实情形反映出来,给世人、给后代“留下一个真相”。

陈文尽管评说了《大地》的缺点,但她说,还是“要向《大地》的作者表示祝贺:一来因为她深怀同情之心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的家庭;二来因为她创作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读者会发现你很难不把它一气读完。”陈文最后特别对赛珍珠的“忠实的创作意图、对人物持有真正的同情之心、脱离了做作的文风与腔调的束缚”,表示了极大的赞赏。

总体而言,陈衡哲的书评,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看待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并且比较冷静、客观地评价描写中国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我们今天的赛珍珠研究中,这,同样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注释:

①叶公超、陈衡哲二位先生的文章由郭英剑先生译为中文发表在《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第93—96页。本文采用了郭先生的译文,特此声明并致谢。

②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版。

③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版。

④《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责任编辑 陈庆安]

1931年东方人用英文撰写的关于 赛珍珠《大地》的三篇书评

郭英剑 译

译者按 1931年赛珍珠出版了她的成名作、也是其代表作《大地》，立刻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次年即获普利策奖。然而，《大地》毕竟是描写中国以及中国农民的生活的作品，因此，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似乎更有发言权。事实上，《大地》在出版以后，在中国文学界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三十年代就翻译出版了8个中文译本，对其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这里译介的是最早发表的、由东方人用英文撰写的书评。这三篇书评在我国的赛珍珠研究界不大为人所知，所以不常被人提及，个别文章在提到时也语焉不详。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译出的第三篇文章的作者康永熙，在目前我国学术界被认为是中国人，从译出的材料看，他实际上是朝鲜人。笔者现将这三篇文章译成中文，以期引起赛珍珠研究专家、学者的注意，前两篇文章标题为译者所加。

(一) 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 ——评赛珍珠的《大地》^①

[中国] 叶公超

当听说一部描写中国的小说出自一位西方人之手的时候，能够阅读英文的中国人心里明白，假如他不得不信的话，那他也只是将信将疑，从阅读此类作品的经验看，他可以料想到，在众多的角色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人物形象：首先，是一位达官贵人，他相貌威严、不苟言笑，是一位大阴谋家，当然如果作者高兴的话，他还应该是一位儒士。其次，是一个妇人，常常是逆来顺受、注定要倒霉的

东方女性，她寡言少语、唯命是从。她冷若冰霜的美貌面对私情与罪恶也只能听天由命。再次，犹如只有中国人似乎难以使故事情节发展下去一般，小说一定还要加上外国人，诸如：美国商人、中国通、失望的传教士以及寻欢作乐的水手等。另外，我们懂得英文的中国人还能预期：这篇故事充满神秘色彩，配以慢条斯理而又富于浪漫色彩的背景，还有数不清的会意的微笑与点头称是。而且，尽管人物活动的场景肮脏不堪，但从中国人口中说出的古代的警言妙句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作品已经多的数不胜数，就连最敏感的中国人对此也已见怪不怪了。所以，当一位西方人无论是将中国旧有的美德过分理想化，还是用其他一些什么人物以取代实际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中国人对此除了付之一笑，还能怎么样呢？

然而，赛珍珠在《大地》中所写的某些东西却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对此给以充分理解的话，它们